

追寻五帝

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

郭大顺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

郭大顺

著

追寻五帝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郭大顺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五帝：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 / 郭大顺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5-06704-5

I. ①追… II. ①郭… III. ①原始社会考古—中国—
三皇五帝时代 IV. ①K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447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 www.lnpph.com.cn](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9

字 数：130 千字

印 数：1-5000

出版时间：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董 喃 张 洪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一路 征 郝 强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徐桂秋

书 号：ISBN 978-7-205-06704-5

定 价：18.00 元

序

顾颉刚先生整理中国古代传统，提出了层层累积的观念，以解释传统系统的时间轴在线的建构过程。顾氏的说法，表面上颇与考古地层学的观念相近，然而考古的地层一层便是一层，如果上下两层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渊源，则上下之间未必有承袭的关系。

郭大顺先生清理五帝传统，都是真的从考古数据着手，遂能将时空两个轴线整合为原定古代传统的线索。《追寻五帝》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坚实，因此有如此可佩的研究成果。

苏秉琦先生从大量考古资料中，依据地层学与形制学的线索，将中华大地的考古文化，理出区系类型的系统，终于实证地指出，中国的古代文化是许多系统之间的接触交流、迎拒与融合。这一宏伟理论，兼摄时空的多元互动。苏先生的贡献，不仅为中国考古学提示了解释演变的理论，我相信这一理论，还可适用于世界各处文化的互动过程。

郭大顺先生是苏先生的入室弟子，《追寻五帝》即是将苏先生的考古理论，施之于传说的研究。我在拙作《万古江河》中，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长程发展，以及近来全球化的展望，也是拜领苏先生理论的启示。

回到“五帝”这一课题，诚如郭先生的研究，这些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都有所归属，分别与古代若干族群的文化，有其一定的关系，凡此本书均有详细论列。除此之外，更多一步推论，我们也无妨瞩目古人为什么不断建构几个不甚相同的“五帝”系统？

我以为，古代族群众多，每一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祖先祠、英雄谱。在不断地融合与重组过程中，这些记忆中的重要形象，也必须重加编排，以建构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解释其接受与排斥的理

由。最后，正如我们熟知的，“黄帝”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祖，“炎帝之后”勉强列为共祖的配角！

距今四五千年时，若干曾经兴盛的古代文化，忽然都趋于衰败，同时也有迁徙别处的现象。只有本来并不十分出色的中原，不但存留了下来，而且竟形成后世中国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又接纳融合了新来族群，确立了夏商周的“三代”。这一个沿着黄河两岸发展，西逾华山，东至海岱的核心地带，其文化英雄事迹是尧舜禹禅让与汤武征伐，凡此都足以延至这一核心地区政权的“合法性”。核心文化也可上溯其祖源，炎黄遂是其正统的先世，而将若干挑战者，列为反面人物，例如蚩尤与共工，甚至“诸夏”谱系之列的东夷英雄后羿，也只能列入闰统的另册，由少康取回诸夏的“合法”地位。

我以为，不同的“五帝”系统，可能是在不同情景下，将那些与核心有关联，却又不是核心直系的古代族群，以其英雄或祖先亲族，排列为一群可以接受，但又不必然是祖先的英雄谱系。于是，最为迹近的东方族群，有太昊、少昊代表日神崇拜的东夷集团，帝喾（高阳氏）则代表了原在北方，后裔中一部分迁移淮汉的祝融八姓，而颛顼则以其隔离天人的大巫身份代表了可能原在渤海平原的族群。至于稍后接触与互动的南方蛮越与北方的戎狄之属，则只能在扩大同祖的旁系子孙，安排其位置。战国秦汉多次整理传说系统，或可作如此推测。

郭先生此书胜义，处处可见，读者自能体会，我不必多所絮叨。此书早已在香港出版，现在在内地出版，实是国内考古学界的好事。苏秉琦先生一生献身于建构理论系统，从他早年瓦鬲的整理，到区系类型的方法学，为中国考古学，以实际数据的归纳，提出纲举目张的阐释。我读书时不在中国，未能亲炙大师教诲，仅能从他的研究，私淑体会博大精深之处。郭大顺先生是苏先生的大弟子之一，在苏先生百年冥寿之时，将本书引回内地，庶几考古学家以外的读者，也有开卷得益，诚是可喜之盛事！嘱我为序，十分荣幸，谨以管见献曝高明。

许倬云 谨序

2009年11月19日

写在前面

这本书是遵照苏秉琦先生的遗愿，并在他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苏秉琦（1909—1997年），生前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导师和到辽宁工作后的指导者。他所创建的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系统论述，不仅是长期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理论，也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和接受，正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

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是苏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所创建的学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4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与徐旭生先生合著《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一文；50年代，他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60年代，他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了仰韶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关系；70年代，他亲自为吉林大学考古教学实习在冀西北桑干河流域选点，终于获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碰撞的重要线索；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史前考古新发现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他在倡导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及时提出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有机结合的问题，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他并以考古学研究成果分析古史传说，提出如五帝时代分前后期、发展重心的三大区系、从燕山南北与黄河中下游之间到西北与东南地区之间文化组合与重组的作用等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意见，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

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对此又有进一步发挥，可惜未及更系统详细论述。

我大学期间的两次考古实习和毕业论文都是关于河南省洛阳王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生实习是整理山东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地和观摩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等材料。王湾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属中原地区，不过那里的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大量“鼎豆壶”系列，这种本不是中原地区原生的文化因素，大有替代当地原有文化因素如彩陶、小口尖底瓶的趋势，并在以后长期成为中国礼器的主要组合。究其原因，当时考虑较多的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直到两年后接触到大汶口材料才有新的理解。大汶口墓地的几乎每一种器物的主要部位都有比较敏感的时代差别，变化节奏极快，尤其是“鼎豆壶”的发展序列完整，典型性强，江浙地区也有近似现象。这时，苏秉琦先生《论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发表，文中提出从仰韶文化后期始，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渐高于中原，并对中原古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豫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鼎豆壶序列，就是受了东南地区大汶口等文化影响的结果。他安排研究生到东南地区实习，也是意识到考古材料已在反映出东南地区古文化的这一特殊重要性。我在北大学习的60年代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在酝酿之中，但在北大考古专业已经有了以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指导的教学实践，我有幸成为受益者。到辽宁工作后又得到发现和发掘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这样难得的机遇，对苏先生提出的辽西史前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先走一步”的观点比较容易接收。

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几处遗址仍然都保持了典型性和标尺的位置。尤其是它们都恰同五帝时代诸集团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就不仅为我进行这项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也使我感到有责任在这方面多做些思考。1995年我应《寻根》杂志之邀，写了一篇题为《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的短文，请苏先生审阅，先生在热情鼓励的同时，针对若干难点多次给予具体指导，此后就酝酿写就了这本小书。

谨以此书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目 录

序1

写在前面1

一、走出迷茫——寻找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 (一) 徘徊疑古与信古路上2
- (二) 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金钥匙.....6
- (三) 聚焦三大考古区系.....10

二、仰韶文化新认识——华族源起

- (一) 寻根黄土塬.....18
- (二) 一个优生支系的诞生.....21
- (三) 从氏族到国家 26
- (四) 花卉与华族.....32

三、东南古文化的启示——夷夏交胜

- (一) 鼎文化圈.....38
- (二) 泰山脚下虞舜迹.....40

(三) 太湖之滨觅夏墟·····51

(四) 夷夏交胜新解·····60

四、圣地重现——北方古文化的突破

(一) 龙出辽河源·····72

(二) 中国金字塔·····76

(三) 神的世界与人文初祖·····80

(四) 五千年古国在东北·····87

五、碰撞与融合

(一) 华山玫瑰燕山龙·····101

(二) 塞北古鬲的文明火花·····103

(三) 黄炎相遇三岔口·····107

(四) 唐虞汇聚汾河湾·····109

六、考古展现五帝图景

(一) 新“三集团”说·····116

(二) 涿鹿大战定乾坤·····120

(三) 神权独占：绝地天通颛顼帝·····123

(四) 与大自然抗争：洪水与治水·····126

(五) 志在盟主：逐鹿中原·····130

后记 ·····134

走出迷茫

——寻找考古与历史的结合点



司马迁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有了从“五帝”说起的通例。但是，这一天经地义的史学体系却在近代遭遇到很大的挑战，直到近年随着史前考古学的飞速进展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才有所改变。目前虽然还不能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都作具体确指，然而那正在一页页揭开的“无字地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十分令人鼓舞。

（一）徘徊疑古与信古路上

“五帝”在《史记》里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与他们同时的著名人物和部族还有先于黄帝的神农氏，与黄帝大约同时的炎帝与蚩尤，与颛顼“争为帝”的共工氏，可能属于苗蛮集团的祝融等等。夏、商、周三代的先祖都是与五帝有关的重要人物，更有记黄帝“监万国”，尧时“协和万邦”，到夏禹会盟时仍是“万国”之势，看来“五帝”远不只是几个显赫的人物，而是代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古国林立，英雄人物竞相称霸，此消彼长，五帝不过是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据研究，五帝时代可以分作前后期，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前期，主要事件是战争和宗教改革。记载黄帝由北方南下，战胜由中原北上的炎帝与蚩尤，统一诸部落，又有文字等发明创造，“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又“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率民由荒蛮跨进文明社会，被历代尊为“人文初祖”；颛顼实行宗教改革，“绝地天通”，取得通神独占权，是一位地位仅次于黄帝的宗教领袖。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后期，“鸿水滔天”，治水成了国家大事，又实行禅让制度，创立了较完备的国家机构和行政体系，吸引诸邦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后建立奠定基础^{（1）}。

司马迁是一位公认的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在这本共达130篇的纪传性通史中，将《五帝本纪》定为开首卷，而对五帝以前的记载只字不提，是参阅了大量文献史料，经过反复考证，并且进行了实地调查访问而作出的。他又认为：“《尚书》独载尧以来”，是“缺有间矣，其轶乃

时时见于他说”，断定“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司马迁的实地调查，“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所到之处“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所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盛行的时候，五帝的记载几乎被全部否定了，认为都是周秦两汉时代所编造的。现代史学界也长期以来把五帝时代作为古史传说来对待⁽²⁾，中国文明史只能从五帝时代以后的夏代写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五帝时代没有考古实物作证，尤其是没有像两河流域的乌尔（Ur）神庙、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莫亨觉达罗（Mohenjodaro）古城那样具有象征性的实证。中外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和年表，大概深受中国史学界这类观点的影响，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或把中国文明史的开端留作空白⁽³⁾。这样一来，在世界上古文明史上，中国就只有4000年的文明历史，这比并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比印度的古文明也晚了近千年。而欧洲的爱琴文明因对距今约5000年的克里特（Kriti）文化发展水平认识的提高，已渐多地被列入世界文明古国之列，大有取中国而代之的趋势。世界史和中国史这种走势的长期延续，使中国历史考古学界的有识之士深感责任重大，社会各界随着眼界的开放和对祖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关心，也越渐热心地关注起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更加热盼着象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五帝时代的真迹被很快发现。看来，从考古学上追寻五帝踪迹，已不仅是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而且也成了牵动亿万炎黄子孙心弦的大事。

其实，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出现起，学界就已在注意考古学对解决古史传说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学家李玄伯就说过：“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⁴⁾1928年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所长傅斯年在谈到该所包括考古组在内的宗旨时明确提出：“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

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⁵⁾，表明考古学就是要找到地下实物资料来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而不拘泥于文献。

也就在同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工作逐渐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的学者已经着手在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上进行大胆尝试。当时史前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遂逐渐在黄河中上游及周围地区确立了一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并命名为“仰韶文化”，认为这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⁶⁾；一是1930—1931年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梁思永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的东方地区确立了又一种以黑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龙山文化⁽⁷⁾。

这时，从1928年开始连续大规模发掘的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殷墟已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此前对甲骨文的释读与《史记·殷本纪》所列商代诸王世系的对应，以及商代后期王都即安阳殷墟的确认，对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的尝试是一种鼓舞⁽⁸⁾。于是先有依据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地域与传说记载中夏人活动地域较为吻合，提出仰韶文化就是“虞夏民族的遗迹”⁽⁹⁾；后又有认为仰韶文化的出土物与更早的五帝时代有关⁽¹⁰⁾；对东方的龙山文化则多以商文化的起源与东方的夷族有关联为出发点，而认为龙山文化应就是与成汤革命前的先商文化有关的遗存⁽¹¹⁾；也还有将《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人早期活动情况，同已发现的多处仰韶文化遗址相印证的⁽¹²⁾。虽然那时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起步不久，所获取的地下实物资料零散而不系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古史的结合，难免有些简单比附，但这种努力显然是可取的。

与此同时，当时史学界在研究古史记载中的区域文化或部族文化方面不断有新成果。王国维提出殷周不同源⁽¹³⁾；傅斯年则有《夷夏东西说》⁽¹⁴⁾；蒙文通将中国古代民族或部族分为江汉民族（炎族）、河洛民族（黄族）和海岱民族（傔族）⁽¹⁵⁾；疑古派领袖顾颉刚也对五帝、三王一脉相承的世系提出疑问，以为他们是各有始祖的⁽¹⁶⁾，夏、商、周来自不同地域⁽¹⁷⁾；徐旭生是对古史传说作过系统研究的一位，他在对

古史记载进行分等级的系统分类整理的基础上,把中国史前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¹⁸⁾。以上研究成果,与当时和以后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地域性特征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并对几十年以后形成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产生影响,对此,考古学家苏秉琦有过这样一段回顾:

“在30年代初,中国老一辈考古学者根据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其他同类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河南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仰韶、龙山与小屯’的三层文化遗存叠压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做类似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把它们区别开,分立‘户头’,这就意味着把以往位于山东的‘城子崖’、位于河南的‘仰韶村’和‘小屯’为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并列起来,这和同时代中国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夷夏东西’或‘三集团’诸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大体相似的。我还记得,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北京看望梁思永先生时,他曾同我谈起,他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说徐先生提出了‘三集团’一说,他也有他的‘三集团’想法,很遗憾,他当时没有同我再深入地谈出它的具体内容如何。1965年我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用图解形式试图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的论点,这同前辈诸先生的启发不能说没有联系。”(图1)⁽¹⁹⁾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这种相互接近的趋势,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也并没有停步。1960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出版,徐先生十分明确地肯定:“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他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兼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一身的尹达,在80年代初他晚年最后的一篇文章里也说过:“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质?考古学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种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质(地),切不可一概抹杀。”⁽²⁰⁾这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历史考古学界对待古史传说的一种主流观点和积极态度。不过,有鉴于考古与历史结合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简单比附的倾向,又多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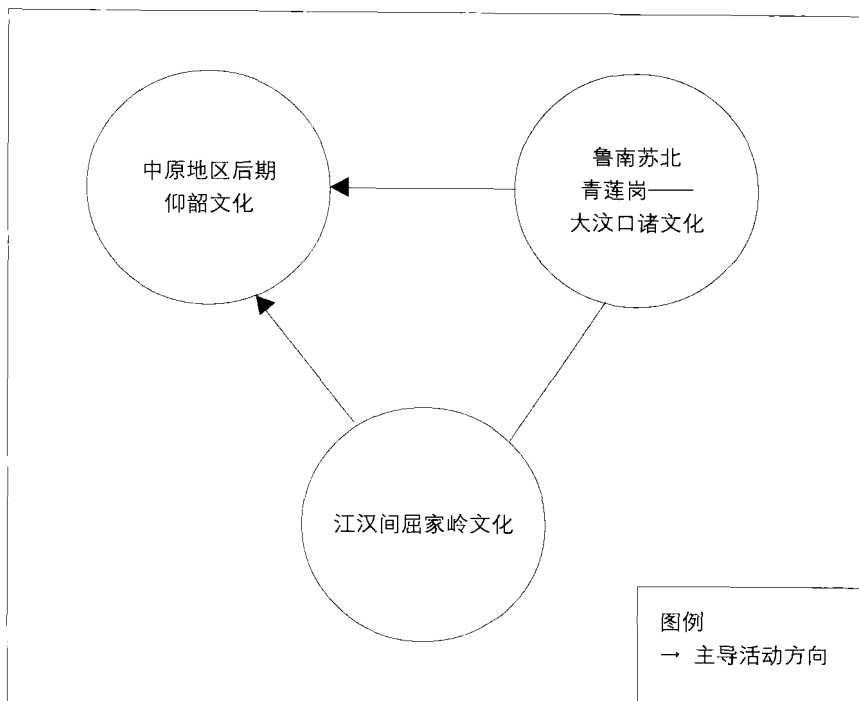


图1 距今5000年前后五帝时代的文化交流之一，是以东南沿海、江汉两大区系影响中原区系为主导方向的。

在这个甚为敏感的领域里，行动要慎而又慎，以免引起更多混乱。当然，怀疑甚至全盘否定古史传说真实性的言论仍时有表现。

（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金钥匙

就考古界来说，由于近代考古学一经传入中国，就是以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复原历史为学科目标的，所以对用史前考古资料解释古史传说这一任务始终念念不忘。问题在于，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地下实物资料，如何让这些不带文字的“哑巴”材料说话，这尤其需要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突破。在这方面，经过长期艰苦探索而取得可喜成果的代表，是苏秉琦和以他为首的中国考古学派。

苏秉琦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洞察中国考古学科飞速发展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郑重而及时地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

史”的设想，提出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进行系统、有机结合的新课题，因为“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²¹⁾。“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提出，对于很长时间里多少有些沉闷的史前史研究领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更使切盼寻找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地下考古实证的国人为之欣喜。最能说明社会反响的一个消息是，就在苏秉琦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前不久，他的一篇论述史前考古新成果的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²²⁾发表，这篇文章中因在从考古资料的分析中联系到五帝事迹时所表现出的“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光明日报》1988年8月17日），而被选为1988年高等学校考试语文试题中的阅读题，于是在那年的夏季，有近300万未来的莘莘学子同一时间在阅读一篇考古文章，这十分生动地表达了亿万人心渴望寻找自己祖先根脉的真切感情。

老一辈考古学家、台湾学者李济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几次提出过重建中国史前史⁽²³⁾。虽然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李先生的想法无法实现，但从50年代到90年代，前后经历40余年，这一上古史的重建任务都是由考古学家提出来，这就充分说明，“重建”工程是考古学家从考古资料的研究入手进行认真思考得出的结论，它表现出考古学家涉足这一敏感领域的勇气，也显示了考古学在史前史的研究中必然要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趋势。当然，90年代初的再度提出，条件已比较成熟，这不仅是指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料的积累，尤其是近十多年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更为主要的是，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断创新和突破，这方面的主要标志，是考古学已经绕出长期困扰历史考古界的两个“怪圈”，提出考古学科自己的学科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²⁴⁾。科普界或又称“条块说”。

关于长期困扰历史考古界的两个“怪圈”，指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和以社会发展史代替全部历史这两种倾向。前一种倾向表现为，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民族和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就不是正史，把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早晚关系，如夏商周，看成是

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以汉族为中心、以中原为中心、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实际上是对包括史前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全貌的一种扭曲;另一种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观代替历史本身的倾向,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在这两种倾向影响下,古史传说和史前考古的研究虽在长期探索中不断有所接近,但面对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五千年文明史和五帝时代的考古证据却哪一个也没有被识别出来,仍然只能用虚幻的传说来代替,或者干脆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把商以前的1000多年填充起来,凑够5000年整数。史前史研究的曲折历程表明,要实现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的系统有机结合,用考古资料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就必须绕出这两个怪圈。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就是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奋斗了半个世纪,才找到的一把解谜的钥匙。

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人口密集地区主要从史前到先秦时期的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图2),它们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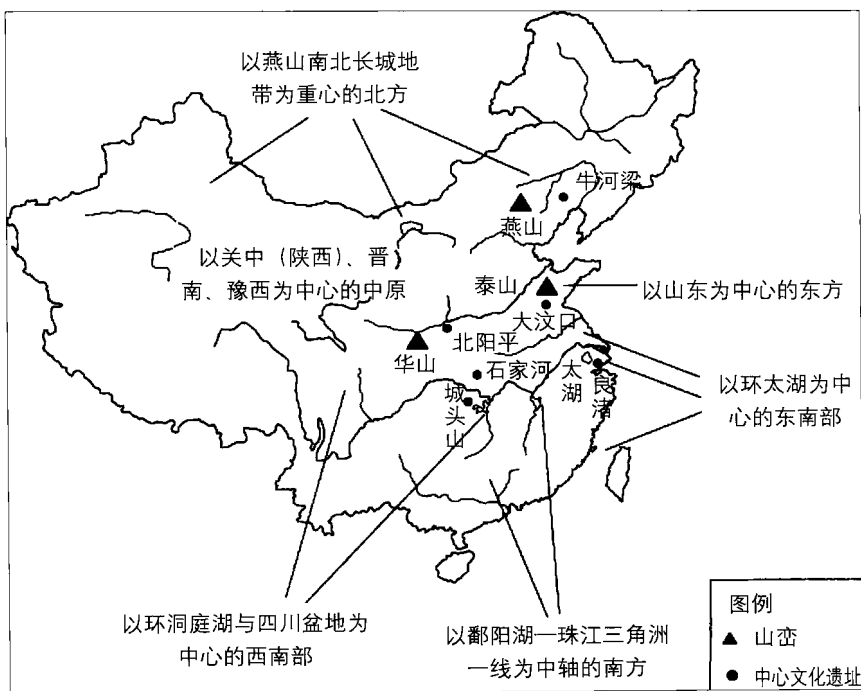


图2 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的划分及中原、北方、东南沿海诸超中心聚落的确定,为追寻五帝踪迹开阔了思路。